

语域分析与翻译研究

张立

(广东药学院 外语部,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阐释了表层语言选择与文本交际功能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含义间的紧密联系, 本文论及的语篇、语域分析法便是以该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方法。House 的语域分析模式旨在通过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对比分析来考察情景变量、语体、功能及语言。Baker 的分析对于研究文本的主位结构和衔接结构特别有用。Hatim 和 Mason 则超越了 House 的语域分析模式, 翻译对语用学和符号学的研究已成为他们模式的一个探讨主题。

关键词: 语篇; 语域; 分析;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63(2007)02-0128-05

Study of Discourse and Register Analysis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ZHANG L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Abstract: The discourse and register analysis approaches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based on the model of Hallidaya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hich links micro-level linguistic choices to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a text and the social & cultural meaning behind it. House's model of register analysis is designed to compare an ST-TT pair for situational variables, genre, function and language. Baker's analysi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focusing on the thematic and cohesion structures of a text. Hatim and Mason move beyond House's register analysis and begin to consider the pragmatic and semiotic dimension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and semiotic implication of discourses and discourse communities.

Key words: discourse; register; analysis; translation

20世纪90年代,语篇分析开始在翻译研究中崭露头角。语言中语义及社会和权力关系的传递方式成为语篇分析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模式。本文重点讨论 Halliday 模式以及与该模式有关的几本重要的翻译研究著作。

一、Halliday 语篇分析模式概要

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的 Halliday 语篇分析模式在语言功能的表层实现和社会文化框架之间显示了强烈的相关性。这样,语体便受制于社会文化氛围,而其自身同时又制约着系统框架内的其他要素,首先便是由下列三变量构成的语

域:语场、基调、语式。语域中任一变量都与意义的某一元素相关,所有意义元素便构成文本的语篇意义,称为三大纯理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

这三种抽象的纯理功能必须通过比较具体的语义系统得到体现,它们与词汇选择和词汇语法的关联大致如下^[1]:1.文本语场与概念意义相关,而概念意义的实现取决于句式的及物性(动词类型、主动/被动结构、过程参与者等);2.文本基调与人际关系相关,其实现方式有赖于情态句式(情态动词及一些副词,如 should, hopefully, possibly;任何评价性词汇,如 beautiful,

dreadful);3.文本语式与谋篇意义相关,这是由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主要指小句成分的顺序和结构)以及词语衔接(词汇构成文本的方式,包括使用指称、省略、词汇搭配、重复等)加以实现的。

对纯理功能的分析研究在 Halliday 模式中占有重要位置。词汇语法结构与纯理功能的紧密关联表明,我们对文本中及物性、情态、主位结构及衔接等语言现象的分析就是在阐释纯理功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文本是如何传情达意的。然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语域分析法才在翻译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House 等学者意识到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过程,这一特征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看都是极其明显的。至此,语域概念及语域分析模式与翻译和译本评估的关联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House 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House 本人并不认同翻译的所谓“更为目标读者取向理念”。她将其语篇分析模式置于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分析对比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翻译质量评估概念,强调了翻译中的“不匹配”或“误差”现象。

本节我们将关注 House 后来提出的“修订版”模式——《翻译质量评估:模式重温》^[2]。该模式将她早先的一些类型纳入 Halliday 语场、基调、语式三分法的语域分析中一并讨论,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语篇特质进行了系统比较。该模式运用了大量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复杂的分类学手段,但就其通过词汇、句法及语篇方法加以实现的本质,我们可将其简化为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语域分析模式。

House 模式中的语域涵盖了多种要素,其中有些 Halliday 亦未有提及。图中语场指主题事物、社会行为以及词项的特殊性。基调不仅包括说话者因时因地的社会身份,还包括其认知和情感状态(说话者个人观点)。语式则是话语方式及交际双方参与的程度(独白、对话等)。

House 模式运作方式如下:首先生成源文本语域特征,再注入通过语域实现的源文本语体性质。这样,我们对源文本的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就基本上可以作出陈述,换句话说,也就是传递了什么信息以及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再将上述过程应用于对目标文本的处理;接着,对照两种文本特征,根据语体及语域

和语体的情景特点确定并归类所谓的“不匹配”或误差;这些情景特点误差叫做“隐性误差”;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显性误差”,即本义不匹配,或目标系统误差,最终形成翻译质量评价。整个翻译可归类为显性翻译或隐性翻译。

显性翻译并非要求目标文本一定要原汁原味。按照 House 的模式,一些源文本在源文化中具有“独立地位”。这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它们同该社区和文化息息相关,且明确针对源语接受者。二次大战中邱吉尔政治演讲的译文便是一例,其演讲与特定的源文化、时间及历史语境息息相关。文学作品的翻译也不乏其例,皆因这类作品往往与源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所致。对于此类译本,House 认为要在语言(语篇)、语域和语体层面上寻求对等^{[2] 112}。然而,由于目标文本和源文本所处的语篇环境不尽相同,二者各自的语篇功能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为此,House 建议“次级功能对等”策略,使目标文本保持进入源文本功能的渠道畅通,使信息接受者得以“窃听”源文本。例如,Thomas Mann 的英国读者可通过《魔山》的英语目标文本来体验源文本,但他们清楚他们是在读翻译文本,知道两种文本有着各自不同的语篇功能。

隐性翻译可以在目标文化的背景下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源文本氛围。源文本并非总是和源文本文化或读者完全一致;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分别直接对各自的接受者授话。因此,隐性翻译可以看作是通过生成与源文本功能对等的文本,来隐藏其属于翻译文本的本质。按照 House 的模式,隐性翻译适用于在源文化中没有独立地位的源文本,或者换言之,适用于那些与源语言、传统、历史以及源文化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源文本。由于一个文本缺乏在任何特定文化中的这种根基,因此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该文本的原始功能可以在翻译中得到再现。但这决非简单地靠说服目标文本读者接受源文本语境所能解决的。这样,在语体层面和个体语篇层面上的对等便成为必备条件了。不过译者还是应该充分利用 House 所称的“文化过滤器”^{[2] 114}来打磨文化要素的棱角,从而使目标文本读者感受到这就是原著。这可能涉及到语言(文本)和语域层级的变动。

House 不遗余力地指出所谓显性翻译和隐

性翻译的区别是一个渐变群,并非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例如,翻译中需要隐性的功能对等,而目标文化中又根本不具备源文本中存在的语体,译者则应再创造一个隐性版本,而不是隐性译本,这里的“版本”同时也表示对语体所作的水到渠成的变更^{[2] 161}。

三、Baker的语篇和语用层级分析

House 1977年的那本书也许是第一部引入现时颇为流行的Halliday模式的翻译研究专著。另一部近年来对翻译培训,同时也对翻译研究都有着很大影响的专著是Mona Baker的《换言之:翻译教程》^[3]。Baker考察了各不同层面的对等问题:词汇层、词以上层面、语法层、主位结构层、衔接和语用层面等。本文着重讨论她的系统方法在主位结构和衔接层的应用、以及将语用层引入翻译等内容,照她自己的话说即:“话语在交际情景中使用的方法”^{[3] 217}。

许多翻译研究学者深受功能语法和语篇分析理论的影响,Baker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她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翻译的语篇功能问题。虽然Baker很少直接地对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进行分析,但她却对一份科学报告的巴西葡语和英语两个版本中主位结构的名词化现象和动词形式进行过分析比较^[3]。例如,她分析了源文本中以物主代词式动词结构为开头的句子:

Anali, cou-se as rela, coes da dopamina cerebral com as fun, coes motoras.

(英语字面意义:Analysed-were the relations of dopamine with the motor functions.)

正式出版的英语译本中却出现了名词化词序,结尾用了动词的被动结构: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pamine and motor functions were analysed.

然而,Baker建议采用另一种主位结构以满足英语文本的语体习俗,这包括使用继续保留在主位的名词化analysis,再另外引入一个不同的动词被动结构is carried out:

An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pamine and motor functions.

该研究的一个内在问题是,不同语言的主位结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为此,Baker给出了许多不同语言的例证,如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这些语言都属于动词屈折语言,它们

往往将动词置于句首,或置于“主位”位置,如上述巴西葡语一例所示,而代词主语的丢失则必定会产生不同的主位句式。

事实上,Halliday模式的主位分析完全是英语取向的,用于翻译,其信度肯定要打折扣的。Baker亦接受这一事实,同时也概述了取而代之的、布拉格学派的主位结构的功能句法观模式。该模式充分考虑了交际动态及词序特点,因而可能更适合于动词——主语词序语言。尽管如此,Baker还是认为系统功能法的一大优点便是简洁、实用:主位在前,其他成分居后。

源文本主位分析的重中之重是译者应意识到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的相关标记性。Baker指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说话人或作者在交际过程中做出的寓意性选择”,从而帮助我们决定是否应使用标记形式翻译出来^{[3]129}。另外,标记内容将随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是翻译活动中一种难以平衡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要关注信息动态,另一方面又得考虑难以兼顾的其它方面,如基本句型等。

语篇元功能的另一要素——衔接也是翻译研究的一大主题。Blum-kulka在其著名的研究项目“翻译中衔接和连贯的转换”中建议,增加衔接纽带的外显性应该成为所有译者采取的基本策略。她认为翻译中衔接的改变必将导致文本功能的转换。Blum-kulka提供的例证是用希伯来语翻译英国剧作家Pinter的《过往时光》中的一幕^{[4]302-303}。由于目标语形容词的屈折性,在处理源文本词意隐晦的开场白“Fat or thin?”时,译文不得不采用性别指称的外显形式,因为希伯来语及其他类似语言非得标明所指对象的男女性别。

与主位结构的情况相同,衔接纽带在整个文本中的分布情况和推进机制在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当然,这张关系网在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的状态是各不相同的,因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衔接关系是不可能等同划一的。Baker提供的一系列文字片断及其译文对此作了阐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葡语更常用词汇重复而非代词;阿拉伯语也往往以词汇重复来替代语言变换^{[3]185-186}。

当然,目标文本还应注意语篇连贯,换言之,对目标文本接受者来说其内在联系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语用学和翻译的关系便成了Baker论著的最后一个探讨主题。

Baker 考察了翻译中各层次的语用对等问题,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应用了多种相关语言学概念。她对语用学给出的定义是:“语用学是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即研究交际情景中各参与者传递和操纵的意义,而并非语言系统本身生成的意义。”^{[3]217}

下面我们将扼要探讨语用学的三个主要概念:意义连贯、意义预设和意义隐含。

文本的意义连贯与衔接相关,完全“取决于受话者或信息接受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感受”^{[3]219}。显然,源文本读者和目标文本读者在这方面是不可能一致的。

意义预设与连贯息息相关,Baker 将其定义为“语用含义”^{[3]229}。预设涉及到信息传递者认为接受者已经具备的、或接受传递者信息所必须的语言及非语言知识。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目标文本读者也像源语听众一样具备同样的背景知识,这不仅存在着文化语境上的差异,而且,译文的出现已形成一段时间差,源信息已失去相关照应对它的激活作用。

Baker 对另一种语用含义——意义隐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将其定义为“说话人言外之意,而非口中之语”^{[3]223}。哲学家 Paul Grice 完善了意义隐含理论,并提出了运用于“合作原则”中的一整套规则或准则,其内容包括:数量准则、质量准则、相关准则、方式准则^[5]。此外,有些学者还补充了礼貌准则^[6]。谈话参与者认为受话人下意识地遵循着这些准则,双方相互合作以达到勾通目的。很明显,在限制意义隐含范围方面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

四、语境和语篇的符号层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另外两本源于 Halliday 语言模式的专著对翻译研究影响很大: Basil Hatim 和 Ian Mason 合著的《语篇与译者》和《译者即交际者》。供职于爱丁堡 Heriot-Watt 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这两位学者不仅重视谋篇功能,还尤其关注翻译中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的实现,并在他们的模式中融入了语篇符号层元素。

Hatim 和 Mason 的功能分析考察了 Albert Camus 的小说 *L'Étranger* 中的一个重要片断(小说主人公 Meursault 在海滩上杀害了一名阿拉伯人)。研究发现英语译本中及物性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本概念功能的变换。换句话说,法文原文本中 4 个心理行为过程在译文中却变成了

3 例事件过程,仅存一例真正的行为过程。因此, Hatim 和 Mason 得出结论:与原文相比,目标文本的这种转换使得 Meursault 更为被动^{[7]10}。

Hatim 和 Mason 还探讨了情态(人际功能)转换问题。他们提供的例证是受训口译译员在理解和翻译欧洲议会辩论中出现的法语陈述性条件句时发生的问题。这类条件句(原文略)在译成英语时应表现出可能性情态,而大多数受训译员都将其错误地译成事实性陈述,以致在目标文本中注入了错误信息。

Hatim 和 Mason “文本分析模式的功能”^{[8]14-35} 涵盖并超出了 House 的语域分析和 Baker 的语用分析范畴。这些功能将自下而上(bottom-up)的分析模式和对文本符号层自上而下(top-down)的考虑糅为一体,语言和文本代表着更广义的语篇范畴,被视为社会文化信息和权力关系的体现。二位学者将其定义为:“对社会文化活动领域抱有特定态度的社会团体的说话写作方式(如种族主义的语篇、官场行话等)”^{[8]216}。

他们给出的译者语篇影响例证是关于西班牙人染指墨西哥之前土著美洲人的历史片断。Hatim 和 Mason 指出,在将西班牙语源文本译成英语时,译者的选词倾向(如 pre-Columbian 和 Indian)已将欧洲中心论观点塞入了以当地土著人观点成就的源文本中。

符号层功能也可由方言加以实现。Hatim 和 Mason 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译者关注的主题”^{[8]103},因为方言的独特性及其内涵意义通常要在目标文本文化中得以复制并非易事。另外,文学体裁的传统手法也承载着符号层功能。例如,目标文本为阿拉伯语的译者通篇都应采用正式的古典手法,因为阿拉伯文化视其为唯一的文学写作风格。

虽然 Hatim 和 Mason 论及诸多理念,但对于文本动态元素和静止元素的区别,他们却给予了特别地关注。二者表现为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直接与翻译策略相关:更为“静止”的源文本往往可采用“更为直译的方式”,而更为“动态”的源文本,则“对译者的挑战性更大,决非直译方法处理得了的”^{[8]301}。

五、翻译的语篇、语域分析法批判

语篇分析模式大热于许多语言学取向翻译学者之中,用在处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语义方面也确实行之有效。然而, Halliday 模式还是受到

了诸多指责,其中 Fish 认为其语法分类过于复杂,一一对应的结构和语义匹配也明显地表现出不够灵活,模式将很难应付各类可能出现的文献翻译,尤其是对科技文献的翻译^{[9] 59-64}。

至于 House 模式, Gutt 质疑语域分析是否能重现源文本功能及作者意图^{[10] 46-49}。即使有可能, House 模式的基础是要发现源文本和目标文本间的“不匹配”。然而,不匹配现象虽可表明翻译误差,但这类误差同时也可因其他翻译策略的使用而产生,如外显或补偿, House 模式对此作何解释,尚不清楚。

本文中翻译学者所讨论的分析模式都是以英语为基础的,换成别的语言,问题便来了,特别在分析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时更是如此。欧洲其他语言词序更为灵活,动词形式可导致主语屈折,分析方式应有所不同。如将这种语篇分析方式不加区别地用于可能在概念结构上差别甚大的非欧洲语言,问题将更为严重。

语言差异必将反映出文化差异, Venuti 等人批评语言学取向分析法规定了“一种保守的翻译模式,过度限制了译者在文化创意和变更中的作用”^{[11] 21}。Venuti 讨论了 Grice 的那套准则,认为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非常专业化领域,如对科技文献或法律文件等的翻译处理。Baker 本人也已意识到这些准则的文化偏见: Grice 准则似乎直接反映了那些操英语区域存在的价值观,如真诚、简洁和相关^{[3]237}。

Hatim 和 Mason 对于将 Halliday 文化、思想理念糅合于他们自己的翻译分析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但从他们分析的大量文本类型——书面语或口语——来看,焦点往往还是语言学导向的,无论在术语表达和现象分析方面概莫能外(如词汇选择、衔接、及物性、风格转换、译者介入等)。即便如此,他们的研究资料还是颇具启发性的。

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阐释了表层语言选择与文本交际功能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含义间的紧密联系,本文论及的语篇、语域分析法便以该模式为基础。House 的语域分析模式旨在通过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对比分析来考察情景变量、语体、功能及语言,既鉴别了翻译方法(“隐性”或“显性”),又指出了翻译“误差”。批评者认为模式

混乱、晦涩;然而,它确实为译者提供了揭示一些重要思考的系统方法。

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与翻译、翻译分析关系密切, Baker 及 Hatim 和 Mason 的著作都从其中汲取了一些观点。Baker 的分析对于研究文本的主位结构和衔接结构特别有用。Hatim 和 Mason 的研究虽然仍置身于 Halliday 模式之中,但已超越了 House 的语域分析模式,翻译的语用学和符号学领域,以及话语和话语社团的社会语言学、符号学含义已成为他们探讨的一个主题。

参考文献:

- [1] Eggins, S.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 London: Pinter, 1994.
- [2] House, J.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M]. Tbingen: Gunter Narr, 1997.
- [3] 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4] Blum-Kulka, S.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A]. L. Venuti (ed.) (2000), pp. 298-313.
- [5] Grice, H.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C]. // P. Cole and J.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41-58, 1975.
- [6] Brown, P. and S.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7] Hatim, B. and 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0.
- [8] Hatim, B. and I. Mason.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9] Fish, S.E. What is stylistics and why are they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 [A]. // D.C. Freeman (ed.) Essays in Modern Stylistics [C].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53-78, 1981.
- [10] Gutt, E.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11] Venuti, 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责任编辑: 许有江